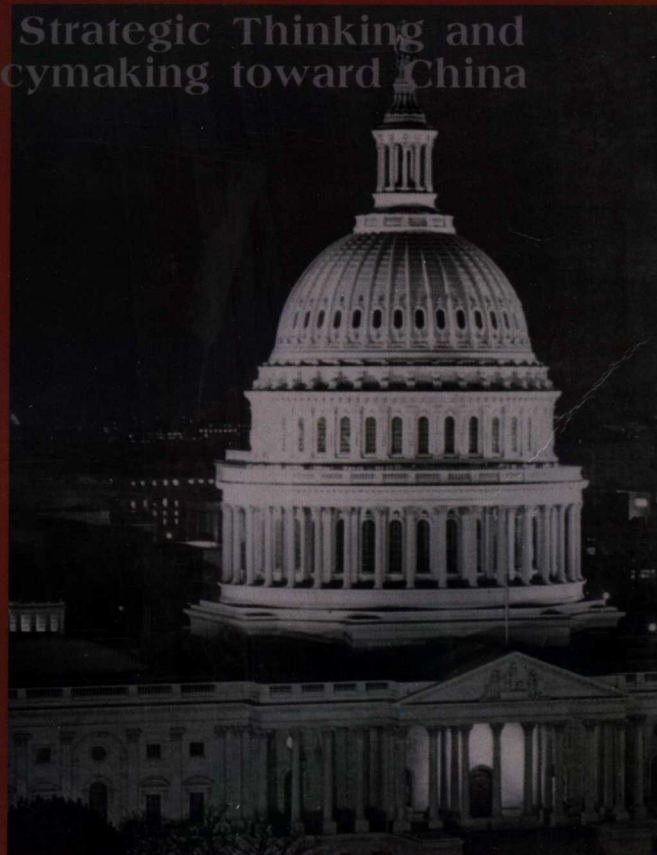


张曙光 著

美国对华战略 考虑与决策

(1949 — 1972)

U.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making toward China



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WJ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美国对华战略 考虑与决策

*U.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making
toward China*

(1949 — 197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 / 张曙光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ISBN 7-81080-775-7

I. 美… II. 张… III. ①军事-对华政策-美国
-1949~1972②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1949~
1972 IV. ①E712.0②D822.3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778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35051812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岳永红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1 字数 32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2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775-7 / D · 000

定 价: 22.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引言

U.S. Strategic Thinking and Policymaking toward China

当人类历史迈入新世纪之际,科技飞跃发展的辉煌与骄傲,足以令“理想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们将和平与发展视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旋律。然而,若从“现实主义”角度冷静审视,世人所渴望感受到的“主旋律”,仍将在经过数百年“以利益为基础、以实力为根本”的“大国折冲”所构成的“艺术殿堂”内回旋。而在新世纪这种以“大国政治运作[Great Power Politics]”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中,中美两个大国间的“恩恩怨怨”、“若即若离”已经在国际关系中凸显为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这点已是不争的现实。

大国关系的一个最核心部分,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也只能是军事或安全战略关系。中美之间也不能例外。毋庸置疑,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成立后,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交往,从几乎为零的起点出发,虽经过磕磕绊绊,确也发展到今天如此的“全方位”、“宽广度”,其结果着实令人瞩目;然而这里不得不指出:制约与主导所有这些交往发展的“必要条件”却是两国间的战略态势与定位——无论是长达 20 余年的公开军事对抗还是维持了 10 来年的“大三角”架构,无论是“冷战”结束初期的再度“遏制”还是 20 世纪末喧闹一时的“战略伙伴关系”,均无一例外地起着制约与主导作用。

美国作为“傲视群雄”的超级大国,将如何在战略上对待中国这个刚刚摆脱数十年内忧外患却仍在奋力赶超的“区域新兴大

国”，实际上是决定两国整体关系的关键之关键。对美国而言，中国是敌、是友，还是“非敌非友”？华盛顿对北京是“遏制[Containment]”、“接触[Engagement]”，抑或“又遏制又接触[Conengagement]”？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依本人之见，只能通过对美国国防与安全战略决策机制的研究得出。

而目前，研究这一课题相对成熟的条件，则是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对抗选择的透视。故而，与此直接相关联的命题是：从杜鲁门到尼克松，白宫的历届对外政策决策者们在对华方面的“战略思考[Strategic Thinking]”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这一长久的战略选择到底有何作用？对这一命题的回答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美国战后的国防与军事战略决策机制，尽管在不同的“总统政府”时期有过这样那样的调整，但其本质上的架构、思维逻辑与决策程序并未出现根本的改变。因此，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冷战国际关系的全面描述有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价值，同时对当今中美关系的解读和对两国交往未来走向的推测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致力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乃至专攻中美关系的中西方学者，对此课题的研究应该说是花了大力气的，然而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人意。其中颇具代表意义的有这样几位学者以及他（她）们的著作：曾任教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的瓦任·科恩（Warren I. Cohen）长期被认为是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权威，他的一本专著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美国对中国的回应] 已 5 次再版。该书从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一直写到该书出版或再版时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虽也时常谈及国防与战略问题并能引用军方所公布的档案文献，但其对美国的对华军事战略考量及其在白宫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探讨，充其量也只是“浅尝即止”。^[1]而在美国国防战略研究领域造诣极深、被誉为“大师级”的美国耶鲁大学教

授约翰·路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的一本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遏制战略],迄今仍是西方研究美国冷战军事战略考虑的最权威专著。故而在 80 年代初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该书不仅成为学者争相引用的“经典之作”,也可作为美国很少几本被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对外关系史课程共同使用的教科书。这样一本大作,尽管在论及美对苏“遏制”战略形成、实施、评估与调整的过程时条理清晰,讲得“头头是道”,而对构成美国的全面冷战军事战略的对华部分,却不是不得要领就是一带而过。^[2]最近,由美国对外关系史学会前任会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梅文·莱福勒(Melvin Leffler)通过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的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力量的优势]一书,应该说是西方现有的最全面、最深入、最严谨地描述分析美国冷战军事战略起源的力作,从“战略资源”入手,极为细致地阐述了杜鲁门政府的军事战略家们的全球战略观与全球战略计划的形成过程。难能可贵的是,莱福勒虽非中国问题专家(直至 2002 年 6 月才第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却花了较大篇幅探索华盛顿对华、对东亚乃至对整个亚太的军事战略考量。然而,十分遗憾的是,莱福勒的大作在写到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时便“嘎然而止”了。^[3]笔者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拙作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威慑与战略文化],虽在对美国长期形成的关于国防与军事战略思维与行为的“传统”与“惯性”如何影响其与中国对抗“态势”的形成与延伸方面做了尝试,但 10 年后再读此书,难免有浅薄之感。^[4]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陶文钊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美关系史,1949—1972》,可以毫无捧杀地说是中国研究中美关系的最佳之作之一,其涵盖面甚宽,中美两方资料均有引用,论述也堪称客观,然而在涉及美对华军事战略时,则显得力不从心,仅触皮毛。^[5]另一位曾在美国研究院深造的中国学者苏格,在其“十年磨一剑”的《美国对台政策》一书中,虽对美国 20 世纪的

后半叶关于台湾的政策考虑与具体实施做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尽管该书后半段稍显薄弱),但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论述,却未有系统或专门的说明,这也是一种欠缺。^[6]

诚然,对任何一位学者,无论他(她)有怎样的训练背景,如果一味地要求“面面俱到”是过于强求了。然而时至今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日趋成熟以及涉及美国从1949到1972年对外与国防政策决策内幕档案材料的不断解密,使得就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华安全与军事战略考虑与实施的专题研究变得越来越现实。虽然,这样的专题研究如控制不好,难免以偏盖全,但在一个面上做深入探讨,则对整体的完善是有益处的。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研究方法而论,从来对如何使理论与史实取得相对平衡争论不休,取得共识似乎仍是十分遥远的事。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们总抱怨外交史学家们“描述”过于细致,只对讲清楚一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津津乐道,所关心的只是“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人[Who]”、“如何做[How]”等要素,充其量解释一下“为什么[Why]”而已。由于史学家很少探究“历史过程的普遍意义[So What]”,故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树参考意义不大。曾几何时,自誉为社会科学家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对国际关系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屑一顾,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携手共进了。史学家们对“政治科学家们”的指责却甚为不满,尤其对他(她)们的“科学研究方法”批评甚多:无论是数理推导出的理论模式,还是逻辑演绎出的理论框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被贴上“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标签。随着分歧的加大,双方在很多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上交流甚少,最终形同陌路。^[7]实际上,理论与史实的结合已势在必行,特别是对诸如美国对华军事战略之类的专题研究更是如此。

据此,本书拟就研究方法上做些尝试。在理论框架上,“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简称 ISS]”的一些基本

假设,将被“借来”为本文研究做目标界定、范围预设。“变量”控制则套用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的关于“战略考虑”的注释,即美国任何一个“总统决策机制”对其国防政策和军事安排乃至外交策略制定与实施,一般说来都“或多或少”地按照其内在的一系列“战略密码[Strategic or Geopolitical Codes]”行事,^[8]而追求“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目标则是编制这些“战略密码”的最基本框架。

这里需要稍稍展开的是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根据对国家安全的传统界定,一国的安全实现主要指有效地保卫其国土不受“外部入侵[External Attack]”,据此,国家安全仅限于“针对外来军事侵略的军事防务[Military Defense against Military Threats]”。然而,这种传统的定义显然十分狭隘且过于单一。现代国际安全研究表明,“国家安全”对不同的国家(这里假定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历史经历基本一致)、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环境均存在不同的理解。此外,对国家安全的衡量除了一些诸如“领土完整”、“主权受到尊重”、“无外来军事挑衅”等相对具体的客观“坐标”外,一国的是否“安全”同时也是一种心态,一种“主观上的评判”。因此,本书接受阿洛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即“[国家]安全,从客观上看,是指不存在外来剥夺我核心价值的威胁,而从主观上看则是指不存在我核心价值被强夺的担心与惧怕”。^[9]因此,为了实现“国际安全”,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要做战略考虑与决策,而这一考虑、决策的理性顺序,根据约翰·路易斯·盖迪斯的研究,应是设定“国家战略利益”,认知对这些利益的“外在威胁”,考量应对认知的威胁的可动员的战略资源水平,进而制定军事战略与国防政策。^[10]

依此类推,考察美国冷战时期对华军事战略行为则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美国对华战略考量的最初出发点是对针对中国的“核心价值”,或称“国家安全利益[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的设定。根据美国对其国家安全利益传统的认知,其最核心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Nation-State]的自身“生存[Survival]”,包括美国的领土、领海、领空须得以“完整无损”;第二,美国国家的政治制度,其中包括自由、民主、公平与公正等政治理念及价值观[Values]须得以延伸;第三,美国社会、经济的繁荣[Prosperity]机会,诸如贸易、航运、海外投资、金融等经济发展不得受到限制与打击。这三者也就是美国战略设计者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所谓“S.V.P”战略利益。在此基础上,美国的战略利益常常被作出一定的先后排序,也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重要利益[Major Interest]”和“边缘利益[Periphery Interest]”。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美国在对华的战略考量中如何界定其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在其“战略利益”的排序中又处于何种地位。

第二,美国对华战略考量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Perception]。现代国际安全研究的一般结论,认为任何国家对“外在威胁”的认知主要受“时空”的影响。对“空间”因素的考虑,通常从“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逻辑出发,一方面从潜在对手相对于本国距离远近以及要害位置来考察界定“外在威胁”的方位,另一方面从国际各个势力与力量间的“均势”状态及其走向来确定“外在威胁”国的对象。而“时间”的因素则是指对“历史上”、“过去”的“外来威胁”所出现的条件、方式、发展过程、结果等“经历”做出的“记忆性”评估和基于这一评估所得出的“警示[Lessons]”,从而形成的所谓“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11]根据这样的“时空”坐标,战略决策者们须进而确认“外在的威胁”是“潜在的[Potential]”还是“直接的[direct]”,是“立即的[Imminent]”、“近期的[Short-Term]”还是“远期的[Long-Term]”。假如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外在威胁”认知模式适合于

美国,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战后美国战略决策界是如何形成所谓“共产党中国是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者”这一理念。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是基于其对自身拥有的“战略资源 [Strategic Resources/Assets]”的评估。现代战争一般意义上的战略资源包括这样几个内容:首先是战斗员,主要指常备、后备军队的人数和一旦战争爆发即可动员入伍的人力;其次是战争消耗能源包括钢铁、燃料、食品等;再次是军事工业生产力,即与国防有关的科技研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简称 R & D]、工业生产规模与军事装备水平以及在战争状态下可“转型”的民用工业设施与生产力;最后是政府可动用的财政预算与战争状态下的资金征集。二战后的美国,虽在 1946—1949 年间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萧条,而其在二战期间形成的战略资源不仅丝毫未损,还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扩张与发展,其总量与质量均超过了冷战时期任何一个大国(包括苏联这一“超级大国”)。所以,研究美国这样的一种战略资源水平是如何影响其对华的军事战略考虑与制定显得十分必要。

第四,美国对华战略考虑的过程导致了“军事战略”的出台。西方战略学家对“军事战略”的理解基本沿用以克劳斯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古典战略学派关于战略的定义,即战略是指“在战争中,为了战争的目的,对战斗或威胁战斗的运用 [the use of combat, or the threat of comba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war in which it takes place]。”^[12]实际上,这种古典的战略定义已经逐步失去了“准确”、“完全”界定现代国际安全环境和经历,充其量只适合于所谓的战争“实施战略 [Operational Strategy]”,也就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军事力量实施何种战争方式的考虑、计划与安排。然而,由于冷战时期“战”与“非战”时期界限的日趋模糊和要求战略的考虑与制定能适应“新现实”的需要,导致了“大战略 [Grand Strategy]”及“国防战略 [Defense Strategy]”的出现,使传统的战

略观大大地拓宽了。简而言之,如果前者是指战略决策者为维护国际安全利益将做战略资源配置的长期研判,那么后者则是在这些研判的指导下政府为准备战争制定的政策原则。以上三个层面的互相结合及互相作用,演化出战后美国的所谓“战略体系”或“计谋系统[A System of Expedience]”。^[13]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中美对抗的20余年中美国对华军事战略在上述三个层面上是如何表现的。

上述美国对华战略运作的四方面以及所涉及的问题构成了本书基本的分析框架,但若对诸如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如此复杂的议题作一般的限定,则必然会走入“简化论[Reductionism]”的误区。为了在此框架上作更深一步的探讨,并找出华盛顿决策内在逻辑的合理与非合理性,仍需就其他一些因素的“动力”作用提出一系列的假设和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假设之一,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在“利益”与“威胁”认知与界定的程序上并非完全按照前者在先,后者在后,往往更多地以“威胁”定“利益”,因此,所有影响华盛顿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因素便显得更为重要。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因素是:美国相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Political Prestige]”或战略“可信度[Credibility]”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胁”并进而不断修订对利益的界定的重要“坐标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二战后“板块政治”的构成使作为一方“领袖”的美国将在己方板块内的“可信度”认作是衡量其“领衔”地位是否稳固的标准,另一方面也给“盟友”,特别是那些对中美关系有着切身利益的弱小亚洲“盟友”们有了影响甚至“操作[Manipulate]”华盛顿的决策朝对其有利方向发展的机会。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就得考虑:美国对华的军事战略考虑是否具有相当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在夸大了中国对美国安全威胁的情形下,是否也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利益?

假设之二,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极大制约,

同时也无法跳出国内政治所设定的圈子。作为一个多元的政治体制,行政决策机构在对外与国防政策的制定上,根本不可能避开国内政治运作而独处世外桃源。尽管由于“理性”现实主义者们长期倡导“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美国原则上也建立了所谓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一致[Bipartisanship]”原则,但一个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以及道德伦理标准衡量必定反映在两党政治、舆论炒作之中,而其影响也必定通过国会政治反映在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机制设立[Institutions]”、“预算分配[Budget]”、“法案制定[Legislation]”及“军事行动允许[Action Approval]”等国家行为上。^[14]二战以后的冷战,在相当意义上是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形态及国际道德规范之争。美国是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的“旗帜”,而中国是“共产主义阵营”中人口最多的“红色政权”,华盛顿的对华军事战略是绝难游离于美国国内政治运作之外的。那么值得考虑的是,国内政治的影响到底是如何反映在战略决策层面上的?

假设之三,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基本运作是在其战后建立的“国家安全系统[National Security System]”内进行的,而这一系统中的“军政关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凸显为一大决定因素。二战后,美国为了有效地担负起其“全球安全责任”,而构建了“军政合一”的国家安全决策体制,其目的是为了取得系统内各个部门间的合作达到“最佳”。然而,实际运作的结果则仍难摆脱“官僚机制”的束缚:部门利益决定了各部门的“画地为牢”。其中,军方(主要以由1947年设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代表)一方面为了维护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的“专利权”,另一方面则为了在国家资源配置上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不得不在体制内的竞争中使出浑身解数。同时,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对在国家安全系统内就军事战略问题与文官们“共事”,也不得不尽力守住自己的“属地”。^[15]在此机制内存在所谓军政“属地之争[Turf

Fighting]”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一种“军政关系”又是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决策的行为与结果的？

假设之四，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受到战略决策者个人因素影响甚大。尽管决策首先是在内、外部政治环境以及行政架构的制约下进行的，然而决策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要通过人去运作。因此，参与各个环节的决策者的包括教育背景、职业背景（特别是是否有从军经历）、政治可信度、行政运作能力与经验等诸因素都会直接与间接地决定其决策行为。二战后美国的行政领导变换是几年一次。随着白宫主子（总统）的易人，参与国防、战略决策的诸如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特别助理、国安会行政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兵种参谋长、各军兵种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高级幕僚也会随之变化，而属于“非政治任命”的部门副主管以及助理主管的人员变动也十分频繁。这个群体的明显不稳定性，使得战略决策的不同层面由于具体人的不断变迁而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打上他们的“个人烙印[Personal Imprint]”，而这些烙印或多或少都是与其上述的个人因素有关。因此，也就存在着同一机制内、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决策行为及结果。在长达20余年的中美对抗中，华盛顿参与对华战略决策的人几乎是在“走马灯”式地变换，这些人的个人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白宫的对华决策？

假设之五，美国对华战略决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的影响。^[16] 决策在决策机制中产生，然而机制的本身也产生影响机制运作的“文化”。而这里所强调的“战略文化”制约作用则是指，战略决策者在“理性”思维的约束下，在就“外来威胁”和“是否及如何使用武力”做决断时，完全忽略甚至否认了敌我双方由于“文化价值观[Cultural-Bound Values and Beliefs]”和“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不同，可能会做出不同的战略行为。毋庸置疑，中国、美国文化差异甚大，应

对外来威胁的经历也各不相同,故而战略决策、使用武力的行为不可能“如出一辙”。如果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一味地仅从自己的思维定式、行为习惯出发,并认定中方也“一定会”如此思考、如此动作,这样的“文化偏执狭隘[Ethnocentrism]”观将会如何制约美国对所谓中国在亚洲的“战略扩张”、“穷兵黩武”的“动机[Incentives]”与“意图[Intentions]”的判断?

对上述假设的论证,本书采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较通行的两种方法:

其一是纵向比较的方法。决策行为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会表现出某种甚或多种特点,但若依此类推,进而得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则难免以偏盖全。只有将单个的决策行为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将其与其他单个的决策行为做比较,方有可能得出接近普遍意义的推论。据此,本书将对美国对华的战略决策行为进行“破译”,一方面将其置放在“亚洲冷战”这一大环境中,另一方面则定位于战后中美间长达 20 余年的全面对抗关系上。故而,本书将从杜鲁门政府(1945—1952)开始,经过艾森豪威尔(1953—1960)、肯尼迪(1961—1963)、约翰逊(1963—1968)时期,以中美对抗关系在尼克松第一个任期(1969—1972)结束时所出现的实质性缓和为标志而告结束。同时,在这一相对较长的时段内,拟将分析视角聚焦于华盛顿所面对的几个重大决策议题上,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越南以及中苏联盟、中国发展核武器等。

本书采用的另一个方法则是历史分析法,其核心是基于所掌握的档案资料、历史文献,力图做出“接近原来”的描述与判断。在过去的 15 年间,美国公布、解密了大量的这个时期关于中国的军事、外交档案,其核心部分(包括国安会、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形成的文件)存于 1995 年 4 月开馆的位于马里兰大学校园的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内。对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的材料,所

存的均已系统开放,其中“精华”部分已由国务院的历史编辑委员会以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简称 FRUS] 分卷编辑、出版。有关尼克松时期的外交、军事部分正在整理、解密中,但通过设立在该馆内的“尼克松总统文献”项目,其中的一部分已作为国安会文件而提供给学者研究使用,其中包括温斯顿·洛德 [Winston Lord] 担任主任的“政策计划委员会 [Policy Planning Council]”文件。除了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文献外,大量有关美对华政策的材料分别存于各个时期的总统档案馆内,不少的个人文献则散存于国会图书馆、美国海军历史资料室、大学图书馆内。毋庸置疑,历史分析法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大量文献已被销毁(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文献保管中心称,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美国联邦政府档案被“永久”保存),“历史的原貌”难以得到复原;另一方面,即便是被定为“永久保存”的材料也是经过千挑万选,故不能排除人为的“主观臆断”、“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使用美国文献时,本书力求客观、全面,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目的。

注 释

- [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美国对中国的回应],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2]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遏制战略],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3] Melvin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力量的优势],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 - 1958* [威慑与战略文化],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6] 苏格,《美国对台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
- [7] 针对这种现象,80年代,很多美国学者呼吁理论学者与史学家加强联系。为了推动此项合作,位于波士顿的美国艺术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曾将两个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召集起来,定期交流。本人也有幸应邀参加。90年代初,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等学术组织,都曾通过研究资助,鼓励支持跨学科地研究战后国际关系。中国数名学者均获得此类资助,且成果斐然。
- [8] 参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第 viii - ix 页。
- [9]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分歧与合作:国际政治论文集],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50. 沃尔弗斯定义的英文原文为:“Security, in objective terms, measures the absence of threat to acquire values, in a subjective terms the absence of fear that such values will be attacked[所谓安全,客观上看,是对价值的获取是否存在威胁的衡量;主观上看,则是指对这些价值是否受到打击存在惧怕与否的衡量]”。
- [10] 参看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第 9 页。
- [11] 关于此点,参看本人拙作,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China and the Korean War, 1950 - 1953* [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1950—1953],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 第 1 章。
- [12] William W. Kaufmann, *Planning Conventional Forces: 1950 - 1980* [为常规力量做规划],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2, pp. 1 - 26.
- [13] Daniel J. Kaufman, Jeffrey S. McKittrick, and Thomas J. Leney, *U.S. National Securit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美国国家安全:一种分析的框架],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1985, pp. 11 - 14.
- [14] Morton H.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s, 1974, pp. 26 - 64.
- [15] 关于军政关系方面的研究,参看 Robert Murphy, *Diplomats among Warriors* [军阀间的外交官],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 [16] 关于“战略文化”的定义,参看本人拙作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apter 1。